

◇译者序◇ 员

译者序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已深得世人关注,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新兴理论也已成为一个耀眼夺目的流派。本书作者以后现代国际关系的全新视域观照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变革历程,以及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

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始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它的兴起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母系时代的母权制度到父系时代的父权制度后,进入到了全面向父权制度挑战以实现人类男女平等的“平权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女性主义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使命是批评父权制社会,争取女性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与就业权等。

第二阶段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不再把批判的矛头单纯地指向男性,而是开始反思自己、批判自己。他们试图从女性自己的特征、生物机制等方面寻找受制于男性的原因,并提出各种改变和克服自我的设想。但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者仍然是争取政治、经济的权利,以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继续探

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其重点从争取权利的社会运动转向更深层的理论构建,研究女性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堂,并产生了当代各种女性主义的理论流派。其间,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以后现代的“解构”方法,分析传统性别制度与不平等社会地位的根源,“解构”传统的学科领域,积极构建女性主义理论,进而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开始了女性主义对各个传统学科的“圈地”运动。

女性主义参与国际关系的三次争论,介入国际关系领域,以结束她们在这一领域中“无家可归”的状况,正是在“后现代”的背景下重新“叙述”女性“自我”的一个“故事”。本书作者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变迁中存在着长期排斥“女性”、否定其作用的现象,并试图以女性主义特有的方法论,打破传统性别故事中认定的种种歧视女性、排斥女性的看法,展示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拓展中所发挥的特有渗透作用。作者的目的是让女性主义的有效理论融入到男性主导的、单一化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使女性主义思想像一首抒情诗柔和地启示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进而为国际关系领域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

全书围绕上述背景,分析了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的三次争论,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上参与该领域的“圈地”活动,构建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在“导论”中提出,性别“盲区”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所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人们熟知的均是男性主导的声音,“男性”的角色常常是州长、政治家、战士、决策者、恐怖主义者、暴君以及那些权力比女性大得多的人物,男人生活在政府、社会契约

的“利维坦”中,而“女性”处于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中,只是“男权”政治的辅助而已。作者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身体特征上只有细微差别,他们在政治化过程中才形成不同的主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劳动分工、个性形成、地位的分派、权力的分配不断得以强化,女性地位的非自主性只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政治文化标志。

后现代思维方式使得女性主义者能质疑现代社会制度的规章,质疑那些将性别知识已经合法化的科学标准。这种质疑总体上是分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即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愤世嫉俗中将所有的习俗和主体还原为碎石瓦砾,从而最终从自我决断中分离开来,将自身融入到多元的后建构主义中。它强调解构权威,包括解构那些一贯处在统治地位的男人们所拥有的“自我”权威,进而成为一种“独特的知识类型”。后现代女性主义则运用性别扭曲现象和确凿的科学数据来判定我们对“女性”的科学理解,通过情感对话式的政治学来完成其理论“圈地”,通过移情作用的合作方式,揭示颠覆正常叙事的断裂性,揭示表面上看起来不像家的“家”,以及隐匿在错位的主体(比如“画家象”~~建造藻原森林~~身上的“画家气质”。作者对女性主义研究的自身体验也反映了这种“后现代”的气质,如作者在导论中自述,她几乎走遍了整个地球,这使她几乎不知道她的归属在何方,甚至从来没有;但正是在这样“无家可归”的精神感觉的流变中,“她”作为紧张冲突的承受者定位于女性主义,这使她感到了体现着永恒性的片刻的快乐,也体验到了生活的更富张力与更具多变性。

在导论与章节之间,作者特别安排了一个引论,以导论为背景,进一步以对女性主义第一波的概述作为铺垫引出后继内容的切入点。

第一章对西方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及其实践

源◇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的兴起、发展的历史成因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背景式描述。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对传统规范科学的“发现”进行质疑,提出了科学的“正当性”问题。现代科学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评价女性行为的价值,但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种科学已经因反对女性的社会偏见而受到严重污染。男性学者在科学领域中一统天下,他们的科学往往通过各种假设来测试各种观点,包括歧视女性的观点。女性主义则认为存在着“无视对象事物的描述与解释,而受制于研究者的兴趣、期望和实验方式的价值取向”的“坏科学”。为此,女性主义毫不留情地批评科学本身是个“肮脏的洗衣店”。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自视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论,并要用高尚的女性主义意识去纠正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则抓住科学理性中的非理性去揭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现实,并把国家描绘成只是监视性别中立的法律代理机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为“非问题化”(desexualization)的女性提供渠道,使她们摆脱私人家庭的非理性空间而进入科学、政府、外交事务、工业、贸易和教育的理性领域,并且在报酬和地位上不受歧视,避免工作中的性骚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儿童发育成长的角度考察对社会的认同过程,提出了具有契约精神的“个人自治”、“关系自治”、“弹性自治”,并以此与体现男性之间‘统治——管理’和‘角色——界定’结构关系的“社会自治”相抗衡,进而解构社会实体的至高无上性,解构以规范与法律为基础的道德决定性,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行动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起点。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融合“本体论——认识论”为新的立场基点,它提出,为了明确地描述人性和社会关系,必须以女性生活的实际“定位”出发,而不是从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生活出发。它要求任何人把自己从权威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构建表象(世

界)的力量,去发现一个已经被歪曲但仍未被毁灭的真实世界”。因此“一个真实世界的表述不是依靠逻辑的发现,而是依靠‘商谈’的社会关系的权力改变”。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对自我、性别、知识、社会关系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怀疑,而后现代女性主义揭示了性别的隐喻,要求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法西斯主义,建构起人类文本真正的开放品质。作者认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都转向了对性别的解构,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在于后者能够从容忍自我决断的政治向移情作用的政治转化。作者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激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似乎并不适合为一种具有后现代流行思想的流派,但将是最恰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因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着力寻找的是现实妇女在资本主义和父权统治两种制度交叉中受压迫的成因与出路,寻求对种族、性、性别、阶级斗争等包罗万象问题的一揽子解决。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作者阐述了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闯入”、“圈地”、“识记”的过程。在第二章中,作者提出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领域第一次争论的介入,体现的是女性为受到重视、发挥能动作用、参与著述、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获得尊重和提升自我而作的斗争。不少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权威人士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不存在“为国际关系的‘女性’行为”和“为‘女性’行为的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别影响”(与男性精英意愿不同)。马基雅弗利看到的是“女性如何毁灭国家”,霍布斯认为女性仅有的是不独立的“对孩子的母权”,摩根索坚持认为要把人类欲望放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权力欲中,而不要放在某个典型的“男人”或“女人”领域内。因而,早期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缺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争论也没有导致两个性别群体形成国际关系日常事务的历史活动。作者认为:通过女性主义学术成果,我们可

远◇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以提到,一些“女性”帮助形成了主权国家,她们也通过明智的王室通婚帮助保卫了紧接的毗邻国土。在近现代,很多女性主义者在追求国际和平事业的同时,公开追求妇女参政的事业和女性主义的国家利益事业。在理论上,自由女性主义揭示了女性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文本的隔离性;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追问谁和为什么是“妇女”以及“我们”要贡献什么给国际关系,占据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边界、其他身份和位置。特别是女性主义对移情政治的重视,向我们展示了国际关系争论中被忽视的故事、人物和地点……作者强调,女性主义的闯入是一种警示,它提醒我们新的政治学产生于传统理论领域的重新阐释中,产生于争论中论点与论点的碰撞中,产生于抵御女性主义势力的意识觉醒中,产生于这种主体的完全构建中。

第三章作者着重阐述了国际关系领域第二次争论与女性主义的再次介入。国际关系的第二次争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第三波”重叠。

女性主义在“第二波”中寻求的是“我们是女人还是女性”的答案,究竟是谁提出了真正的“女权宣言”?女同性恋者、贫穷的有色人种妇女、白色人种的理论家、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生态女性主义者、第三世界的妇女,等等。作者认为,从女性主义的第三波开始,女性主义在理论建设中帮助我们记录了国际关系的当代性别困境,也帮助我们建构了准则和理想,包括平等、解放、分权和政治斗争。从激进女性主义的视野看,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让女性脱离整个父权制的托词。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视野看,女性为了拥有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只能作为被“保护”的替代品。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理论建设,与新现实主义的努力产生共鸣,重复了圈地的划界活动,当然现实主义对圈地划界的合理性问题有着自己的立

场,认为“女性”只应是远离权力的“厨房内阁”。而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的第二次争论,由于没有广泛引入女性主义理论而受损,可能是这个原因或其他因素,国际关系的内部人士发现第二次争论并没有提供“新的真实的理论洞见”。

作者认为女性主义第三波最终适合于后现代主义。无论女人是作为有意义的身份而存在,还是作为人的一种类型而存在,无论“女性”是一组社会确定的典型特征,还是一组社会确定的所需要的性别,第三波都提出了质疑,并证实了女人和女性的不同。作者随后引用了基欧汉的看法,强调女性主义经验论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能够产生“一种”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理论,它将为国际关系提供“一种网络式的观点,强调制度如何促进组织实体、国家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是女性主义者独特的贡献。

在第四章中,作者在乔瑟夫·拉彼德(Joseph R. Sidel)概括出的第三次争论的规范性、分析性、多元性、排他性、关联性五个特点之后提出了第六个特点:女性主义介入了第三次争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了同性恋者、女性和男性组织、残疾人权利组织以及和平女性主义运动的大声疾呼;出现了圈内与圈外、国内与国际、现实与意识形态、模式与反模式、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身份与差异、父亲与母亲、理性与非理性、严肃与娱乐、意识与无意识的对峙;出现了“女性”渴望的追求理性、主权、进步、自我解放、科学的行动特征;出现了导致丧失共识权威、走向相对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方法论的多元趋向;出现了“女性与国际关系”、“偏见与价值冲突”、“体验与性别解构”、“超越与容忍傲慢”、“怀旧与身份进化”、“反叛与知识重构”等重要主题;出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理论学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团体、组织等的各种变体;也出现了女性主义理论的事业因为各种劝诱和意想不到的危险而让人担忧

愿◇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的现象。在概括这些丰富现象时,作者引证了几位学者的观点来进行阐明,如阿希利和沃克认为女性主义者是一些值得尊敬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样值得尊敬的是被国际关系研究放逐在外的“女性”,弗格森和曼斯巴奇则把第三波的反馈方式概括为“争论中的争论与争论”(阅读障碍原译)以求找到这个领域允许的建设性的基点。继而作者富有诗意地总结道,女性主义最令人惊奇的所在就是第三次争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建设,是“文本、机器、身体和隐喻”的行为,像一个驾车者离开了国家和自然的花园,不渴望有个家(阅读障碍原译),既不想被同化和也不想被世俗化。

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女性主义的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安全领域研究的理论成果。作者认为战略既包含着新现实主义者极其关注的安全,又包含着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关注的合作,因而战略思考在国际关系(领域)是最成问题的。作者强调,对和平研究者来讲,女性主义的视角聚焦于人道、养育、同情、直觉、移情和互动,这给挑战军事主义以重要的新式催化剂。女性主义“圈地者”面对着一一种超越相互怀疑与不信任去探索移情作用的可能性的挑战性前景,但在某些同样存有“性别忽视”的领域中,共同体使得安全的法令与避免预先给定“镜像”的审美成为可能。但除了这一领域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无论是和平研究者还是世界秩序学者,都没有自觉地提倡把女性归入和平与世界秩序研究,或把女性主义视角和女性主义问题引入这两个领域。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女性问题是和平中心议题的次要或附属问题。少数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想通过女性自然情感(基于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的意识)的“门”(作为对安全的科学性、独立的感情冷漠的反对),把女性并入与强硬路线相对的安全温和路线的方法中,使之继续存在于女性主义路线上的重要主题内。在这一章里,作者特

别重点剖析了作为“解构—重构”进程的圈地案例 英国格林汉姆康蒙(别网社悦宅公社)的“女性和平营”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与别网社悦宅公社)的女性合作社,以揭示女性主义对生活政治的切实追求。

在第六章中,作者对全书作出总结,提出了八大结论性的观点:一是由女性主义理论促成的国际关系领域现代化的时代到来了;二是“无名问题”(别网社悦宅公社)将不再存在,但是女性主义的努力将没有终止;三是我们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达到容忍差异的国际关系;四是认真对待女性主义无家可归的形式——“无名问题”与“移情作用”问题;五是要看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构建鼓励我们去认识和听取他者讲述他们生活于物质现实中的故事;六是当我们在关系网中时,移情作用导致了团体(群体)对该领域的“圈地”;七是同时发生的许多圈地并不意味着可归结为科学研究认可的“一种”圈地。继而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系国际”,认为这对体现现代性的“国际关系”一词的倒置,让我们发现了对熟悉路标的全新解释。考虑了“关系国际”,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三次国际关系论战,重新考虑每次论战以阐明或者否认“关系”中心的方式及所达到的程度。与此相应,作者最后以简练的笔触进一步指出了女性主义理论“圈地者”们的当代走向。

三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的话语方式充满着隐喻,充分体现着后现代主义对一切传统性乃至现代性的破坏与摧毁,本书的作者正是运用了这种后现代的话语方式来解构并重构国际关系理论,这不仅为解读原著作的文本带来难度,也为翻译工作带来

100 ◇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

挑战。又由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目前尚处于构建阶段,在我国学术界还不为人们熟知,因此,对女性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的理解和翻译也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了使读者能较好地理解作者独具匠心的用意,我们根据翻译的体会特地列出几个重要范畴,加以特别的翻译说明:

女性主义 (Feminism)

有四种含义 其一,该词既指女权理论,又指女权运动,两者的经历过程不尽相同。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期,女性主义者发表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平等自由的公平权利不能限于男性,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如果说这标志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开始,那么,该理论的提出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按《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词典》的说法,“女权主义是关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的一个词……它关心妇女的地位……现代女性主义的语言和目标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它追求女性的权利、性别平等,并对‘女人’一词重新定义”。据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科特的研究,“女权主义”一词大约是在1845年进入英语词汇的,“女权主义”的含义是妇女角色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即妇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女人的解放,它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科特云云)。所以,称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为“女权主义”比较贴切。其二,作为体系化理论的女权主义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的第二波达到高潮,西方女性获得选举权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新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19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保守主义回潮,

左翼激进势力衰退。云里雾里作为一种激进运动随之进入了退潮和反思时期,其态度也变得比较现实温和,显示出成熟的态势,重点转向比较冷静、中肯的理论构建,从而形成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学术流派。我们把该词译作“女性主义”更能反映“云里雾里”在这一时期的特征。其三,本书中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领域及其理论研究的介入,主要侧重于学术领域。女性主义参与国际关系领域的三次大讨论,是为了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争取女性特有的发言权,其直接目标是对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即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新“圈地”,以改变长期由男性垄断国际关系领域的局面。这样的理论“介入”与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方式都不同。将这一时期的“云里雾里”译作“女权主义”,显然无法展示女性主义的当代特征。其四,在中文语境中,“女权主义”意味着以争取“权力”为中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与男性争夺权利,具有很强的斗争意味,容易引起误解。西方云里雾里的发展历史与时代内容,在中文的“女权主义”范畴中很难全面体现。因此,根据云里雾里与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女性主义”不仅易于体现云里雾里的当代内涵,而且也能反映云里雾里理论的发展趋势。

画家象（藻造藻原壳棘城）

英文中“大象”是 ~~漢語素~~ 这是指通常所说的象。法语“~~漢語~~指“女性的”，相当于英语中的“~~漢語~~”，作者创造 ~~漢造漢~~ 原~~素~~一词，是一个隐喻性概念，寓意女性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正如大象可以成为“画家象”一样，以此揭示女性可以拥有多重身份。该词意指女性介入国际关系，重新从实践和理论上“圈定”国际关系领域，在该领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地位。

本书导论开篇引用亚里桑那凤凰城动物园里名为“鲁比”的亚洲象,能熟练用颜料绘画,从而引出如何理解大象身份角色的问题。通常理解的大象和画家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鲁比的行为使它成了“画家象”。作者以此隐喻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没有女性的地位,人们认为这是专属于男性的领域。然而,只要我们转换立场,就能看到女性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贡献,她们有能力参与国际关系的实践及其理论构建。从女性参与国际关系的三次大讨论看,女性并不如传统认定的那样,只适合从事私人领域的活动,她们的身份角色是多元的,正如大象可以成为“画家象”一样。

圈地(与男性霸权)

书中使用的“~~男性霸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圈地”,而是指一种特定的方法与途径——移情合作,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实践与理论进行新的界定和划分,并清理为什么女性一直被排除在该领域之外的理由。“~~男性霸权~~”是理解女性主义参与国际关系、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关键词。首先,女性一直是该领域中的“无家可归者”,男性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主人。自从亚里士多德从理论上确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公共领域属于男人的“领地”,以家庭为主的私人领域则是女人的天地。女性不能介入公共的政治领域,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约定,自然无缘涉足国际关系领域,女性处于“~~男性霸权~~”境地,已是不容置疑的传统。这使女性主义的“圈地”有了必要性。其次,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圈地”,其目的是扩展该领域中的知识范围和理论发展潜能。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有关于女人或“女性”的理论建树,也听不到女性的声音,更不可能有女性的话语权。为此,女性主义试图开垦国际关系知识领域中的性别“盲区”,从女性特有的经验

和立场出发,填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占领国际关系领域中“空白领域”。

移情作用 (袁)

在美学中,“移情”是指审美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审美对象,仿佛对象本身拥有了主体的感情,并对审美对象产生欣赏之情和美感。作者借用这一概念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验,这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移情作用”是指在同等与非同等的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达到各种主体性的交融,获得特定地位中“无家可归者”的总体感觉。女性主义要进入国际关系领域,如果缺乏这种移情作用,各方主体固守自己的原有阵地,相互隔离,排斥异己,女性主义就不可能完成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理论“圈地”。

流动的主体性 (袁)

主体性 (袁) 是一个体现现代性的重要哲学范畴,它强调和突现人作为世界创造者的特定地位与作用。主体性的张扬是现代性走向顶峰时期的标志,人类进入“后现代”,出现的是“主体性黄昏”的另一番景象。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哈贝马斯提出通过“商谈”来建构和突现世界的“主体间性”(袁),认为社会交往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人们各自的意愿,而是来自于人们的“商谈”所导致的结论,因为“商谈”有着为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平等、宽容、和平、民主、自由等普遍伦理的精神资源,所以它能形成体现公正“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安排”。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引用凯茜·弗格森提出的“流动的主体性”概念,意在说明女性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让现有的国际关系领域及其理论接受并认可女性主义的“圈地”行动,进而改变女性传统的身份地位。作者认为,没有什么领域或理论范围是封闭不变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固守在自己的“领域”中,不参与任何相关领域的活动。人们的角色身份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动中,人们角色身份的选择与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参与多种活动领域,获得多元丰富的“主体性”。正如女性主义提出的“政治的就是个人的”主张一样,人们的活动与身份不可能限定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内,即使是传统认定的“政治”领域与“个人”领域的区别,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承认“流动的主体性”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父权制对女性地位的单一定位。历史上,女性的身份只与生育者、照顾者等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她们缺乏参与男性公共领域活动的理性能力,更没有参与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研究的理性能力。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通过“移情作用”,女性的“主体性”日益丰富多样,她们能够存在于家庭领域,从事照顾者的职责,但不仅仅是传统理解的家庭劳动的服务者,她们的活动不局限于这一范围。她们也能够、并且应该走出传统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该领域的活动主体。这不仅使国际关系领域的主体呈现多样性,而且也使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出现“流动的”态势。这种理解正如“大象”可以成为“画家象”、“动物园管理者”可以成为“艺术鉴赏家”一样,女性也可以从家庭主妇变成国际关系领域的“圈地者”。只要已经占有这一领域的人们关注女性参与合作的愿望,以开放的态度理解并接受她们的行为,她们的主体性就可以日益丰富。

为了做到这一点,“流动的主体性”要揭示女性长期被排除在

该领域以外的原因,重新分析对女性身份的传统规定中存在的性别偏见,要求人们放弃固有的性别立场和政治主张,认同与自己持不同见解者的观点。这样不会导致该领域中的“既得利益者”固守已有阵地,排除一切异己观点,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圈地”界限内,也不至于拒绝一切与他人的思想进行交流和“商谈”的可能性。

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

(粤 京 港 台 翻 译 权 均 属 本 社 所 有)

摇摇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不仅是女性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构建女性主义的重要认知方式。女性主义的理论构建,除了通常采用经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以外,立场认识论是女性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女性特有的认知方法论。这种认识论是指女性主义从独特的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出发,分析传统理论和制度对女性地位的界定,指出这种传统定位中的性别偏见和父权制根源,进而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依据,也为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及其理论构建寻找理由。

立场决定观念,对传统社会领域与社会分工的划分,如果站在男性主导的价值立场上,人们很难发现这种划分中包含的性别误区,也不可能反思对女性的传统定位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更无法改变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学科研究中的性别隔离状态。女性主义者意识到,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角色分派禁锢了女性的活动领域,把女性束缚在家庭内,从事单一的家务劳动。各种科学理论也把女性作为母亲、家庭管理者、务农者和照顾者看待。如果从女性主义的立场看,女性的活动延续着整个民族,并且为发展特殊的知识提供

丰富的养料,如她们支持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她们也在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认知权和自主的身份而斗争。但各种传统理论中,无论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本理论,女性的角色行为和认知方式总是被贬为“本能的”、“直觉的”、“情绪化的”。对主流知识和理论来说,这些特征往往被认为女性特有的。鉴于这一背景,女性要走出家庭,进入公共的政治领域,介入国际关系领域,必须从女性特有的“立场”出发进行观察、分析和思考,超越基于男性立场的知识特权,才能得出传统理论不可能达到的认识,形成具有女性特点的观点和理论学科,形成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四

本书翻译的分工为:引论、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由余潇枫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由潘一禾译,导论、各章中专业性较强的段落、索引由郭夏娟译,全书由郭夏娟校,由郭夏娟、潘一禾统稿,余潇枫、郭夏娟合写译者序。在此,要特别感谢的是浙江大学哲学系学生张彦,国际文化学院(系)学生张东和、李毅朝、龚虹波、王小燕、戚震南,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研究生杜洁为本书翻译做了许多辅助性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余潇枫 郭夏娟

二〇〇四年 九月 日

导论 争论与“画家象”



摇摇保罗·维奥蒂(马基斯)和马克·考皮(配)将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全球主义看做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三种主流学派。桑德拉·哈丁(桑德拉·哈丁)描述了三种女性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我认为,这些对主流学派或不同认识论的列举,都没有穷尽该领域中可能值得研究分析的内容,尤其在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的学术结合点上尚留有诸多处女地。

从美国一些主要的国际关系杂志(如著名的《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世界政治》)中,几乎很难看到女性主义的文章,这足以看出该领域研究中的空白。不客气地说,女性主义者阅读这些杂志时会怀疑,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似乎就如“大象”去研究“美学”,它们之间是否不可能有关联性。当然,可聊以慰藉的是,美国有几家国际性的女性主义杂志,如《符号》、《女性主义研究》以及《女性研究国际论坛》,对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在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个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地英国,一本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刊名为《千禧国际问题研究》的杂志,在1995年曾有过国际关系中女性题材的专门讨论。^①最近,一本专由女性主义者编辑的刊名为《选择》的杂志,也有过关于“女性主义眼中的国际关系”的相应主题的讨论。^②可见,随着国际关系与女性主义界线的日益明确,女性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挑战呈